

## 第五章 結論

鬼方是我國古史上一個強大的方國名詞，在傳說時代就有鬼方氏之女與陸終氏聯姻之記載，其子昆吾也在夏代位居侯伯。至殷商時期，鬼方的勢力更為強大。根據文獻記載，殷高宗武丁曾與鬼方交戰三年之久，以武丁高宗國力之盛，而須與鬼方相持多年，可見鬼方之勢力不容小覷。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史記索隱》云：

葷粥，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今人王國維寫作〈鬼方昆夷獫狁考〉一文時，又將昆夷納入此一脈絡與系統中。此一系統影響時間甚久，翻閱史籍，從古自今有不少學者皆從此一脈絡而加以論述。然時至今日，由於地下史料的陸續出土，加上甲骨學、考古學等許多新興學科的蓬勃發展，後代學者也紛紛根據新史料來對此一脈絡進行修正與提出己見。其中頗具爭議的，當屬殷商時期鬼方的事蹟。

據文獻記載，鬼方在商代曾有多次遭受征伐的記錄，諸如《易》、《今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裡皆有記載。以文獻史籍觀之，鬼方無疑是殷商時期商王室的心腹大患。

由於十九世紀末甲骨文的見世，不僅證明商代為信史，而且擴大了史料的範圍與視野，在祭祀、軍事的研究方面亦提供第一手之史料。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十五多萬片甲骨卜辭裡，竟找不到商代與鬼方交兵的記載。反而在卜辭裡，商王室有對名不見經傳的方國頻繁地發動戰爭。在這些方國裡，尤以舌方最受重視。因為它是一個不曾見於文獻史料，但卜辭裡卻存有大量的內侵與征伐之記錄的方

國。不僅如此，由卜辭顯示，商人還將𠄎方內侵之因歸為「帝降禍」、「黃尹作祟」，且與𠄎方進行交戰之前都格外小心與慎重。不僅稱冊告祖祈求保佑，同時更派遣沚𠄎、望乘等大將出兵抵禦。其登人（徵集軍隊）的數量亦是眾方國中最多的。因而諸如林義光、傅東華、于省吾與董作賓皆提出「文獻裡的鬼方即卜辭中之𠄎方」的說法。然提出此說的學者僅以音韻與地域證之，再加上無法對卜辭裡出現「鬼方」一名做出合理的解釋，近來已少人提及。另外，也有學者提出「鬼方即羌族」、「鬼方西來說」等主張。但這些說法不是過於武斷，就是無法得到考古資料上的證實。所以對鬼方與𠄎方這一問題，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本文主張文獻中的鬼方是西方諸戎之通稱。換句話說，卜辭裡的𠄎方、土方以及文獻中的西落鬼戎、燕京之戎等當屬於「鬼方」這一名詞的一部份。

有了鬼方是西方諸戎的觀念後，再去探究文獻裡商與周兩民族和鬼方之關係。根據史籍所載，除商王武丁有與鬼方交戰的記錄以外，祖甲時亦有征西戎鬼方之記載。至武乙、文丁時，周王季歷曾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與翳徒之戎等西方諸戎，致使鬼方實力已大不如前。然鬼侯於帝辛時位列三公，劉心源提出「西方已有西伯，何需另至鬼侯於西」的說法來斷言鬼方並不在西方，本文以為這種說法似乎頗待商榷的。因以文獻史料觀之，西方在商代一直是多事之地，且在文丁殺季歷後，商周二族豈會無仇？因此，本文以為鬼方當位於殷都之西方，且其職責在於監督與偵察周族的一舉一動。然紂因鬼侯女之故而醢鬼侯<sup>1</sup>，自此以後，西伯陸續伐崇、戡黎，逐漸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局。及至武王，更大會諸侯，一舉達到克商之行動。其中在《禮記》裡提到的「西方九國」，孔穎達正義云「鬼方之屬也」，或許已透露出鬼方在鬼侯死後，其族棄紂投周之訊息了。

其次，在卜辭中也可見西方方國聯盟對商王室的影响。在一期卜辭裡，𠄎方

<sup>1</sup> 《史記·殷本紀》作九侯，然《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此外，諸如《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紂）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周禮·掌客》與《禮記·明堂位》記載：「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皆可見九侯即是鬼侯的例子。

曾有與土方、𠄎方聯手入侵商代屬地的記錄。因此，若言𠄎方為鬼方，又怎麼排除土方、𠄎方亦屬鬼方之可能性？到了二期卜辭裡雖仍見𠄎方，但數量已大幅減少，二期卜辭裡，屢見「方」的入侵。作者以為這個「方」並非是一個方國的專名，而是不見「某方」之「某」所致。雖然「方」並不專指一個方國，不過仍由卜辭中記錄的「其有來艱自西」一辭判定這個「方」有部分是屬於西方的異族。然從三期卜辭起，方國結構產生另一新局，原在一二期卜辭出現的土方、𠄎方此時均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饒方、羞方等新的方國勢力之形成。這些方國之中，甚至有些在五期卜辭裡形成了如「四邦方」這樣的方國聯盟。因此，文獻裡的鬼方既然能涵蓋整個殷商時期，那麼鬼方的意涵就絕不是單一的土方或是𠄎方所能涵蓋的。所以，與其從卜辭判斷哪些方國為鬼方之屬，本文以為不如將各期卜辭之戰爭時間作一分組，再對照文獻找出相關的地域與方國。

另外，根據古今學者對文獻的考證，鬼方的地望約在今日黃河兩岸的山西與陝西一帶。這一地域自上個世紀三〇年代起，就陸續出土了為數不少的墓葬以及獨樹一格的青銅器與陶器等器物。本文將此區之考古文化通稱為「李家崖文化」。從李家崖文化出土的器型與紋飾觀之，當與北方文化圈中的朱開溝文化、商文化與西方的卡拉蘇克文化有所往來與聯繫。其中李家崖文化裡出土的羊首劍、環首刀等青銅兵器，不僅具北方文化的特殊風格，同時其製造之技術也對商文化圈產生改變與影響。而先周文化裡的弓形器、管釜斧、戚、長條形五孔翹尖刀、戣、凸刃盞內戈與盞內戈等器型，都可看出李家崖文化對先周文化影響之痕跡。李家崖文化，以文獻與卜辭來看，很有可能包括著鬼方與𠄎方的遺存在內的。可是本文以為仍不贊同將此地的考古遺存命名為「𠄎方遺存」或是「鬼方文化」<sup>2</sup>。誠如在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的關係認定上，王仲孚師認為：

要使夏史真相水落石出，有幾個關鍵問題必須能夠克服。第一個關鍵的

<sup>2</sup>如李伯謙將黃河兩岸的山西陝西一帶定名為「石樓—綏德」類型，並指出此類型當為𠄎方遺存。此外，「李家崖文化」一名的提出者呂智榮亦以為「李家崖文化」當屬鬼方文化。詳見李伯謙，〈從靈石勝界商墓看晉陝高原青銅器文化的歸屬〉，收於《商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492；呂智榮，〈鬼方文化及相關問題〉，《文博》1990年第1期，頁32~37。

問題就是夏代文字的出土。如果沒有文字史料出土，與文獻記載互相對照，有關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問題，恐怕很難得到徹底的解決。目前以二里頭文化直接稱之為「夏文化」，或其他某些發掘遺址為「夏文化」，嚴格地說是頗值得商榷的。<sup>3</sup>

因此，本文以為在關鍵性之文字史料與突破性之證據尚未出土之前，對此仍當持保留態度，並以「李家崖文化」之名來稱呼此一地區的考古文化。

綜合上述，考究文獻後可知鬼方之所以能在中國古史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本身的實力以外，外交與政治的操作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整體來看，首先鬼族人常藉以婚姻方式來結盟其他大族，從早期的陸終氏到後來的商王室都是如此，其目的當藉此維持自我的實力與勢力。其次，鬼族人常與各部族聯合出兵、攜手作戰，這點可從俘二十翟王與西方九國窺知一斑。在鬼族各部落同時進退的戰術下，進而對商王室與周族產生莫大之壓力。然在商周爭天下之過程裡，鬼方雖曾失其首領，但其族勢力仍未減弱。相反地，從小孟鼎的記載可知康王時曾伐「鬼方蠻」與赤狄白狄活躍於春秋時代的情形來看，鬼方能在時代變遷下而仍然活躍於歷史的舞台上是不易的。

然而，這些鬼族人的優勢，相對地也是他們的劣勢。如《國語·鄭語》云：

當成周時，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呂，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

本文以為，在山西與陝西一帶特殊的地域風格、鬼族人的風俗習慣與同進退的族群意識之下，雖能夠於亂世之中保留其族的活動力，但也因文化方面的特殊風格使隗姓的鬼族人勢必與華夏諸國處於對立地位。到了春秋時代終在「攘夷」的大環境下逐漸消融於歷史的舞台之上。

<sup>3</sup> 王仲孚師，〈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檢討〉，收於《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台北：五南，民國85年），頁439。